

20世纪4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

红岩儿女

第三部(1949年以后)

一生都在波涛中

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琤·编著

下

穿越崎岖坎坷，回到北大红楼

——叶向忠的苦难经历和他晚年放不下的一桩心事

【按】叶向忠，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确实是一片忠心向着共产党的洋溢着生命活力的绿叶。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的家乡，王屋山下的济源县就沦陷了。他当时只有十几岁，随着一个流亡中学到了河南西部，曾约了两个同学想要到延安去，千里迢迢跑到大西北也未能如愿。他姐夫焦敏之在延安抗大教书，姐姐也在延安，当时还能通信，寄给他一些延安出版的杂志。学校据此认定他是“共产党员”，就把他开除了。他考进当时在豫西南的开封高中，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社会科学读书社，当了一届社长，不久就成为一名真的共产党员。读书社和它联系的进步社团成员近三百人，“红”了学校的半边天，招致校内外反动封建势力加紧迫害。他到重庆红岩找党，还是要去延安。党组织告诉他，大后方正需要你这样的学运骨干，与其到延安再派回来，还不如直接到大学去。他就和一些高中同学考进西南联大，以原先的社会科学读书社的同学为基础，组织实学社，抗战胜利后复员到北平，进入北大，这个以“实”字为社风的进步社团，实实在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实实在在地为爱国民主运动服务，不事张扬，不务虚名。不作惊人语，不抛头露面，实实在在地积蓄了迎接解放的力量，团结了一批认真读书、热心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他担任北大党总支副书记，带领地下党员和实学社社员，为保护北大和市内许多单位的财产文物不受损失，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后，任北大党委书记。尽管他非常留恋大学里熟悉的环境和气氛，党组织调他到北京市委统战部去的时候，他立即走上新的岗位，并且力求熟习新的工作所需要掌握的理论、政策、业务知识，一头扎了进去。

这样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的知识分子，到了1957年那场风暴中，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却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下放劳动。1978年胡耀邦任中组部长的时候，他给中组部写信申诉，1979年初，二十多年前错划“右派”的问题得以纠正。

在“反右派”风暴来临之前，他没有“鸣放”；在批判“右派言论”的时候，他还奉命参加了《北京日报》的写作小组。后来到了党员整风的时候，他主动地老

实地检查了自己参加为中央起草一个文件的工作过程中涉及的一个具体事项的可能不甚恰当的提法。自己不检查，别人也不会把这当成一回事；自己一检查，在当时风声鹤唳的大气候中，就被一些要在运动中发挥积极性的人们人抓住不放，穿凿附会，无限上纲，再搜寻一些他平时说过的话，捕风捉影，断句取义，都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自己越是要证明自己没有这样的思想，越是招来更大的压力。同情他的大有人在，可是，在“反右派”大风暴的威势下，谁也无法为他说理。他终于被扣上了“右派”帽子。从此，沉冤二十多年。

这就是40年代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骨干分子、曾任北京大学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和解放后北京大学第一任党委书记的叶向忠，在50年代中期突然被推进深渊的经历。

突如其来五雷轰顶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打算在秋季开一次中央全会，讨论统战工作，责成中央统战部起草几个文件。中央统战部为此组织了三个小组，其中一个起草关于改造资产阶级工作的文件的，由李维汉领导，许涤新主持。当时在北京市委统战部负责工商处工作的叶向忠奉命参加这个小组。小组的九个人住在北京西郊万寿庄，讨论了一个多月，从理论到实际，议论了关于资产阶级改造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

在讨论会上，虽然常常有热烈的争辩，但方向是一致的，都拥护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只是在工作如何做好具体问题上有所争论。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叶向忠与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全面公私合营以后企业内部关系如何，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公私双方共事仍是阶级关系性质，应当在党的领导下发挥资本家的积极作用，使他们在工作中有职有权有责，以企业为基地，更好地对他们进行改造。叶向忠自然也是这样看法。

在这样的前提下，有一次会上，讨论全面实行公私合营后，原来的《公私合营企业条例》要不要修改的时候，叶向忠提出，如果修改，可否考虑不必明文规定私方接受公方领导。因为，他觉得，合营以后企业的领导权实际上是在公股代表手中，党、青年团、工会的组织都在发挥作用，公方领导不明文规定，没多大关系，而在实际工作中，在企业里并不是大事小事都需要由公方代表决定，不做明文规定可能更有利于使资本家有职有权有责，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个意见，不过是在研究工作过程中对具体做法的一种设想，并非在公共场合发表考虑成熟的主张，本来也说不上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只是可能会引起某种误解。

在万寿庄的文件起草工作结束以后，“反右派”运动已经过了“鸣放”阶段，进入批判阶段。叶向忠回到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里又派他到北京日报社参加范瑾负责的批判右派的写作小组。他在报社又工作了一个多月，再回到市委统战部的时候，北京市委的“反右派”运动已经告一段落，转入党员普遍整风的阶段。在整风会上，他作思想检查的时候，以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检查了自己在万寿庄的文件起草小组上提出的在修改《公私合营企业条例》的时候可以不必明文规定私方接受公方领导的意见，说自己认识到这是自己的一个错误。

在去万寿庄之前，在“鸣放”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叶向忠到办公室，听到有人说，某同志准备写一篇文章，批判储安平对国务院总理副总理 12 人清一色都是共产党员的意见。叶向忠在旁边当即接上了一句：“这个问题，恐怕还不好驳吧？”他自 1951 年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位置上调到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以后，经常受到统战理论和政策的教育，脑子里形成一个明确的观念：政府各部门的领导班子里都要安排若干民主人士，才合乎党的统战政策。原先政务院就有几个副总理是民主人士，现在国务院副总理也应该有几个民主人士才好。当时，他并没有看到储安平发表的“党天下”的说法，他只是认为对国务院清一色有不同意见不好批驳，更没有反对党的领导的意思。后来在北京日报社写作小组分析储安平的言论的时候，他对“党天下”的说法也是反对的。

在党员整风会上，他也主动检查了这个问题，说明在“鸣放”开始的时候自己没有注意看右派分子攻击党的言论，说明自己政治觉悟不高，对国务院副总理不安排党外人士的认识也不清楚，但在自己思想上绝无反对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的想法。

他在党员整风会上主动检查的这两个“问题”，立即被抓住不放，引伸，曲解，拔高，说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党的领导”，依照历来政治运动的惯例，被认为检查得“不深刻”，还要“深挖思想根源”。显然，不检查出来“反党的思想根源”，是决不可能“过关”的。可是，自己当然明白，即使挖到老根上，也找不出来有一点点“反党”的思想苗头。怎么办？他就把自己的笔记本、写过的东西，一股脑儿交给了党组织，希望仔细审查判断。

在这中间，搞运动的人又发掘出来他的一个“问题”：1956 年，他曾作为市委统战部工商处的一个负责人，主办过北京市资本家讲习班，每期三千多人，三四个月，办了四期。每一期，除了请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作报告以外，叶向忠也讲两三次课，主要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有关讲话，结合资本家的一些思想情况，讲解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定他为“右派”的时候，从他的讲课材料中挑出来一句话，说他对资本家讲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这也是否定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他说，他确实对资本家讲过这样的话，是讲到无

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可以互相影响的时候说的。他讲了：无产阶级的成员，如果不很好地改造思想，也会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成员，如果认真接受改造，也能够受到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因此，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来通俗地说明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可以互相影响，又有什么错误呢？

事实上，对于叶向忠主持的资本家讲习班，曾经做过两次全面的总结，上级都是完全肯定的。第一次总结曾由中央统战部在党内通报，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第二个总结曾在《北京日报》上发表。都是作为成功的经验表扬和推广的。北京市委统战部对叶向忠在讲习班的工作，从来也没有提出过什么问题。为什么一到“反右派”，忽然从中找出来一句并没有错误的话，就把一个有功劳的人变成罪人了呢？

此后，他听从市委领导人的劝说，又尽力做了多次思想检查。这些全都无济于事，到末了，还是根据他自己在整风中的思想检查，抓住几句似是而非的片言只语，加以牵强附会，上纲上线，把他硬是定为“右派分子”。

更为荒唐的是，定案的根据之一，竟然是在“反右派”运动中的“态度问题”：一是“向群众提出辩论”；二是“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其实，是在他多次检查以后，批斗他的人们仍不罢休的情况下，当时的党支部负责人之一在会上提出：“你不同意大家的意见，可以辩论。”他在“上纲”上不去，又没有什么“反党思想”可以“交代”的困境中，才提出希望党组织审查自己的全部工作，并表示同意进行辩论。其实，在当时，哪能容许辩论？！直到1979年他请求党组织甄别1957年的定案问题的时候，还说：“今天看来，在运动中提及辩论也还是应当吸取的教训。”教训就是，这不只毫无作用，而且只能起反作用，加重自己的“罪过”。

打人另册二十多年

1958年起，他和许多“右派分子”一起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此后每年都有被认为“改造较好”的摘掉了“右派帽子”，他在劳动中和各方面的表现决不比别人差，却延续了五年也没有能够“摘帽”。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自己在这期间每次的思想检查和定案的结论仍然相距太远，也就是说，还没有“低头认罪”。

直到1963年初，在廖沫沙担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期间，才由海淀区委组织部通知叶向忠，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在这以前，“摘帽”的前提是“低头认罪，彻底检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并在群众大会上做检查。而他这次“摘

帽”，既没有要他作什么检查，也没有开群众大会。据说，这是最后一批“摘帽”，这一次不摘，就要长期留着了。

“摘帽”以后干什么？先是把这位从来只接触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放到海淀区温泉公社淀粉厂当副厂长。他认真对待，研究起来淀粉生产的关键问题。他发现，主要问题是酸碱度难以掌握，完全靠老师傅的感觉测定，有时候老师傅也拿不准。他跑到轻工业学院请教，答复是：我们这里没有淀粉系。他又跑到清河粉丝厂参观学习，原来这个厂也是依靠老工人的感觉、经验。他妻子的哥哥是学化工的，家里有些化工方面的书，他翻阅了一些，看不大懂。在这个厂一年，时光白白流走了。

1964年，把他调到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审处，参加高中语文课本编辑组。这个编辑组共有八人，七人都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其中五人是长期在高中教课的老教师。只有叶向忠一人不是学中文的。刚到这个组，研究问题时候插不上嘴。但他对工作还是很认真，研究一篇课文的时候，尽量多看一些参考资料，加以对比分析，也能发现和提出一些意见。经过一年努力，也就能够和其它同事一起工作了。和一位编辑合作，编成一本半工半读语文课本。可是，刚刚付印，“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一年多的辛苦，又白费了。

“文革”开始不久，他又因为有翻案思想而被“群众专政”，失去自由。当时被“专政”的人很多，被集中到一个个“牛棚”里看管。如果被认为检查的好，可以解除“专政”，恢复相对的自由。过了几年，“专政对象”绝大部分被释放了，只剩下他和少数几个人。原因，还是他没有低头认罪，没有检查翻案思想。他始终认为对他的定案是错误的，但并不想在那个混乱期间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当时当权的那些人。他也不愿意为了解除“专政”而违心地检查自己的翻案思想，因为这不仅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问题。1969年下半年，军宣队来了，他才写了一份关于1957年给自己定案的一些思想问题的材料，请求重新调查了解。军宣队负责人找他谈话，说已经做了一些调查，有些问题现在调查不清，1963年已经摘帽，这次也不算翻案，不再做结论，事情已经完了，今后努力工作吧。于是，宣布解除对他的“专政”。

他和几个人被下放到延庆山区大庄科村。这里耕地很少，而山上果木很多。杏、山里红、核桃、栗子都不少。当地农民只是到果实成熟的时候去收一收，平时不加管理，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阡陌垫地，争取多打粮食。费力很大，收益很少，远不如经营果木。可是，老乡们说：我们先得填饱肚子啊！只能先抓粮食。这里山上核桃树很多，可是挂果后就发生黑霉病，不熟就落了。他们建议打农药防治病害，有的小队采纳了。他们还建议搞点试验田，有些小队也采纳了。他们也参加一些工作。可是，他们这些人对农业都不熟悉，农业生产周期又长，在当时

的体制和政策下农民也没有积极性，他们在那里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而增加农民负担。不久，就又被调回北京。

回城以后，他被分配到 145 中担任高中语文教师。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尽管我上的中学大学都是著名的学校，老师也大都是名师，但是我在学校里主要精力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对学校的课程只是应付考试，没有好好学。而且在‘文革’中我被抄了家。一切书籍都没有了。刚到 145 中的时候，只从我外甥那里借到一本旧《辞源》，是我唯一的一本参考书。那里的老师们对我期望很高，认为我是北大毕业，又是从教材编审处来的，教学中有些难点，都来找我寻求解答。我感到有些为难，就请他们把问题先告诉我，然后我去研究，研究之后再相互商量。在 145 中七年，我备课主要在首都图书馆。‘文革’期间，学生不认真学习，课堂秩序很难维持，学校对于教学方法也不怎么管，我就按照我的想法来教课。讲论说文结合逻辑，讲现代文结合现代语文知识，讲古文结合古代汉语知识。七年里，写了一本逻辑学讲义，一本现代语文知识讲义，几本古代汉语知识笔记，几十篇课文讲稿，总共教了八个班高中毕业生。只有最后一届毕业生有机会参加高考。由于各科教师、学生共同努力，有几个学生考上了北大、清华、南开、浙大等著名大学。其中在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薛涌曾来看我，谈到他在大学学的现代汉语课与在中学学的差不多。”

这七年总算没有白过。他曾给为取得大专学历而上函授大学的三位年轻教师辅导古代汉语课，还举办过示范讲课，受到赞赏。有人说：“叶老师是老师的老师。”

在困顿的年月里，不论在哪里，不论做什么，他总是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以敬业的精神，尽自己的所能去干。事实证明了他对人民的忠诚，证明了他的人生价值，也证明了二十多年前对他的处分是多么荒唐。

1978 年 6 月，在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他听到“文革”以前的冤假错案也可以复查纠正的消息，立即写了请求组织甄别 1957 年对他的定案问题的申请报告。1979 年 1 月间，北京市委统战部党支部通知他：1957 年被错误地定为“右派”的问题，已经纠正。他的夙愿，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但是，他一贯服从组织分配，奉命到北京市政协担任副秘书长，直到 1988 年退居二线，1994 年离休。

在这十五年间，他联系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帮助北京市的政协委员学习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筹建北京市社会主义学院，主持征集和出版北京文史资料，包括北平地下党斗争史等等，还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的编写工作。他希望政协在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在这方面作了研究，写了专论。他特别注意研究了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的民主协商思想、求同存异思

想，研究了蔡元培在北大创办时期兼容并包的思想，分别写了专论。此外还写了许多有关统战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如：《为什么说知识分子是依靠力量，非党知识分子干部又是统战对象》、《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是人的全面发展》、《陈独秀在崎岖坎坷途中对信念的坚定与执着》等等。

为五四纪念馆奔走呼号

叶向忠在他的晚年，特别怀念老北大的红楼和红楼北面的民主广场。“文革”期间和以后，红楼长期由国家文物局占用，民主广场里则盖了许多房子，作为文化部、文联、作协、《求是》（原《红旗》）杂志社等单位的办公用房。北京大学老校友们回想当年在这里的学习生活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朝气蓬勃的岁月，追思在这里接受的五四运动的启蒙精神，都希望能够恢复红楼和民主广场的原貌，在那里建立五四运动纪念馆。

1996年11月间，他执笔为北京大学校友会起草了给党中央的一封信，说明北大校友对现在五四大街的原北京大学红楼怀有崇敬的深情，希望中央批准将它开辟为五四纪念馆，并以此为基地，广泛收集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次青年学生运动的文物史料，加以系统的整理，作为对青年和民众进行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传统的生动教材。中央交有关部门反复研究，各方一致同意北京大学校友会的建议，认为这对研究和宣传中国青年运动史、开展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确有积极意义。但是仍在那里办公的各个单位，短时期内建成新的办公用房十分困难，只能先做些准备，以后再有步骤地筹建五四纪念馆。

后来他们又向有关领导人建议成立五四纪念馆筹建组，却没有被采纳，原因不明。1999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他们再建议中央批示有关单位积极筹办，中办转给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仍无下文。一二九时期的北大党支部书记刘导生听到北大校友会建议开辟红楼为五四纪念馆的消息，非常激动地说：很赞成这个意见，现在国家文物局还在红楼办公，把红楼糟蹋了！后来，文化部和文物局决定促使占用单位逐步迁出，但却将筹备建立的纪念馆名称改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后又改成“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自行成立了筹备处。

北大广大校友对此表示很不理解。2002年1月初，北京大学党委根据广大校友的意见，再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写了一份报告，强调指出“应将红楼辟为五四纪念馆而不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理由：

1.“五四”运动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卖国政府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并逐渐扩大为全国范围的伟大的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历来成

为全国青年纪念的重要节日；而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翌年改为《新青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它在“五四”运动中有了重要发展，因而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见《中国大百科全书》）。

2. 1917年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并不是“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的《新青年》与“红楼”没有直接的关系。

3 新文化运动的概念要界定。新文化是新经济和新政治的反映。从科学性和历史性来严格推敲，“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而“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不讲“五四”，单提新文化，难以使后人有一个正确的历史界定。

4. 如果把“五四”运动局限和隶属于新文化运动，从名称上即排除“五四”爱国青年运动的重要内容，显然是很不全面的。通常说“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不能理解为只是发扬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五四”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具有划时代意义，其影响范围很大而且深远，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而不能说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运动。因而，将“红楼”命名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不能体现五四运动的深度、广度和全部重大的历史意义。

同时，北大校友会写了一份建议筹建五四纪念馆的情况向老校友刘导生汇报，他当即转给团中央一位书记，希望团中央支持这件事情。原意是由团中央和北大党委联合向中央报告会比北大党委单独报告好一些。得到回音，也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北大党委再与团中央联系的时候，等了好多天却再也没有得到反应。北大方面只好单独向中央作了报告。

北大党委的这个报告送出后，也如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得到回音。

不久，2002年4月间，红楼前的大门边，赫然挂出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大牌子，就这样向社会开放了。五四纪念馆呢？就这样被代替了吗？

从1997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筹建五四纪念馆，到我们写作此文的时候，2007年2月1日，十年过去了。不仅占据着民主广场的文化部等单位都没有搬走，就连2000年国家文物局承诺要从红楼逐步迁出的该局所属各单位，七年了还没有动。国家主管文物保护的最高领导机关，居然能够堂而皇之地自己长期占用国家重要文物场所。人们不禁要问：其间有什么蹊跷？

北大校友们没有因此死心，他们还要继续努力，再向中央请愿，寄希望于2009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以前能将筹建五四纪念馆的愿望落实，争取20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建成他们心目中的五四纪念馆。这不仅仅是北大校友的希望，也是广大的受到五四精神哺育和鼓舞的人们的希望。2007年春节期间，在北大校友联谊会上，三百多名校友签名，建议北大申请收回红楼、子民堂

(蔡元培纪念馆)及其附近北大老校区,筹办五四纪念馆、五四研究会。叶向忠在会上发言,呼吁充分认识五四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尽快恢复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北大原校址、五四运动发源地和司令部的原貌,以此为陈地,大力宣扬继承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以促进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说:这是一件千秋事业,五四传统五四精神需要代代相传,原我们这一代北大人共同努力!

叶向忠有感于五四运动的主帅陈独秀的生平遭遇,研究了有关材料,写了《陈独秀在崎岖坎坷途中对信念的坚定与执着》。文中以翔实的资料说明,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罪名,是斯大林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推托自己的责任,强加给陈独秀的。叙述了陈独秀在南京监狱中“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胸怀,出狱前后既不向国民党作检讨,也向共产党宣称“无过可悔”,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原则,决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铮铮铁骨,以及康生污蔑他是日本特务的时候,周恩来、徐特立对他的劝慰和他的感动。特别关注到,陈独秀晚年深入剖析苏联政治制度内部,提出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触及产生斯大林专制独裁的深层根源,强调了民主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没有民主监督的政权必然要沦为独裁专制,必然要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告诫人们不要简单地否定资产阶级民主。

这应该也是叶向忠在经历了多年坎坷之后,他自己晚年的思想境界,从中也可以感知他怀念北大红楼和民主广场,一心要在那里建立五四纪念馆的内心动力。他为北大红楼和民主广场写了这样的赞辞:

她是春雷,唤起人民强烈的爱国意识。
她是种子,孕育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她是丰碑,凝聚着中华民族蓬勃的力量。
她是号角,奏出浩气长存的时代壮歌。
远望北大红楼,注目民主广场,
我们赞扬不朽的五四精神。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我们走向明日的辉煌。

【编者的话】叶向忠被无端打成“右派”之后,既不许他自己申辩,对他有全面了解的上级也不能出来保护。最高领导人发动的运动,威力就在这里。最高指示就是尚方宝剑。运动依靠的就是“积极分子”的“专政”,“积极分子”说啥就是啥,而且“战果”越大越好,谁也不能稍有忤逆。大量的冤案就是这样造成的。所

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其具体含义就是如此。除了一整套专政机器以外，更具杀伤力的就是所谓“群众专政”。每次政治运动都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则是其发展到极端的一种表现。根本原因，是没有维护人权的起码的民主法治。

走过二十多年苦难的历程之后，叶向忠不能不怀念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母校北大的红楼，还有红楼北面的民主广场。他作为北大校友会的副会长，和许多校友一起计议，建议中央批准，由有关单位合作，把红楼，连同民主广场在内，开辟和建设成为五四纪念馆，作为向青年和民众进行五四传统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一个教育基地。回到红楼和民主广场，当然不只是怀旧，而是要继续走向当年理想中的尚未达到的目标，奋力前进。

好事多磨。再三努力争取，过了五年多，结果却是在那里挂出来一个“北京新文化纪念馆”的牌子。正如北大党委的报告中说明的，“五四”和“新文化”两者的内涵大不相同。为何排斥“五四”，实在令人费解。人们不禁回想，1939年曾举国一致把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而1942年国民党当局却蛮横地擅自取消了这个规定，尔后把5月4日改称“文化节”，贬低这个光辉的日子的含义。相隔将近六十年的这两件事情，何其相似乃尔！

叶向忠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组织实学社和参加爱滚民主运动的经历，见《红岩儿女》第二部《从漩流到洪流》第37章《北平和平解放中的红岩儿女》。

为了办晚报受难二十年

——复旦大学新闻系校友游仲文的悲欢(宋铮访问记述)

【按】1957年8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反右派战线”专栏中,有一条题为《揭开“同人晚报”的秘密》的消息,是新华社发到全国的通稿,讲的是重庆日报社揭露出一个“右派小集团”,说他们攻击共产党的办报路线,秘密筹办“同人晚报”。这个右派小集团的核心人物中有游仲文。游仲文,是十几年前我们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

四十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在1957年那场风暴中翻船的不少,游仲文是其中之一。

在我的印象中,游仲文有强烈的民主追求,遇事常有独立见解,属于红岩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但他说话慢条斯理,做事不慌不忙,又是一个比较谨慎持重的人。不知怎么他也未能逃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灾难。

1983年春我到重庆,看望了他。当时他的右派冤案已经昭雪,回到他原先所在的重庆日报社。从他的衣着用具之类可以看出,生活相当清苦。他说回报社时候全部家当就是一个小铺盖卷,被子还是向弟弟要来的。听别的朋友讲,他的年已花甲的老伴,每天除了干家务还要帮助招待所做点洗涤工作,以贴补家用。我见到了他的老伴,看得出是一位贤惠能干的主妇。她跟着仲文遭了不少罪,显得很瘦弱,老来还要如此操劳,叫人心里真不好受。

1998年,为了编写《红岩儿女》搜集材料,我和伙伴们又到重庆。再次与仲文交谈,知道了他究竟是因为什么被打成右派的,所谓“小集团”是怎么回事,以后二十多年的日子又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认定,他应该是作为个案记述的红岩儿女中的一位。

参加党报工作的喜悦和困惑

游仲文是四川自贡市人,世代书香,读过私塾,小学中学成绩优秀,尤长语文。1944年夏考入迁徙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入学不久,他就参加了进步同学组织的各种活动。作为战时首都,重庆市的报纸很多。仲文和进步同

学们最喜爱的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其他许多报纸也都各有特色，除了国民党的党报军报以外，大多有一定的自由民主倾向。这年冬天，以复旦进步同学为主举办的《中国学生导报》创刊。仲文始终积极参与这个学生报纸的种种工作。新闻专业的学习和实践使他对于办报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憧憬。

1946年夏天复旦大学复员回上海，游仲文随后前往，在上海继续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毕业后回四川，在重庆《国民公报》工作。1949年冬重庆解放。不久，《国民公报》停刊，他和这家报纸的一些人被分配到《大公报》。后来《大公报》也停刊了。1952年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创刊，他被分配到重庆日报社。当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从大学生时期就一心向往共产党，由于受到《新华日报》的潜移默化，视共产党为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能到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作，他当时真是满心喜悦，兴奋不已。

到了重庆日报社以后，他渐渐地感觉到，报纸的风格与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大相径庭；报社里上上下下的关系，远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融洽。他感到困惑，内心不满，甚至失望。他认为，报上来自党委和各个领导机关的东西太多了，来自人民群众的东西太少了；重视政治、经济新闻是应该的，但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社会新闻、文化新闻、体育新闻和介绍新科学知识新文艺作品的副刊，在版面上却没有应有的地位。这样的报纸似乎只是给当官的看的，与寻常百姓无缘。特别是，这不符合重庆老百姓多年的生活习惯。重庆在八年抗战时期是战时首都，人文荟萃，文化生活相当活跃，每到日寇飞机不能滥肆轰炸的雾季，戏剧、电影、歌咏、舞蹈的演出，绘画、木刻的展览，许多学者、作家的讲演，使山城人民得以享受比较丰富的文化生活。解放后人民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更高了，我们的报纸应该适应读者这方面的需要。他还回想，抗战时期重庆的报纸很多，竞相争取读者，力求满足群众多方面的愿望。这些报纸，特别是《新华日报》，有不少反映实际生活、联系人民群众的成功经验，为什么不能根据解放后的新情况有选择地吸取呢？当年一些报社有不少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的人员，解放后因报纸停刊而被迫转业了，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回到新闻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呢？

他看到报社有些领导人业务能力不强，文化水平不高，却又以老资格自居，拒绝批评和建议，压制民主，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动不动就追查给他提意见的人的动机。他深恶痛绝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在重庆日报社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的同学杨本泉、张天授和在大公报馆的同事曹岳霖等。他们对重庆日报社的状况也有类似的意见。几个人休息时常在一起坐茶馆聊天，不免涉及报社的领导，尤其是当时报社的总编辑。这位总编辑是在解放区办过报的老同志，常把“我比你们多吃几年革命饭”挂在嘴边，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滥用党的威

信在报社侮辱人、压制人、陷害人。此人还有一条当领导的妙计：上面来了指示不传达，留作据以显示自己高明和批评部下的资本。报社的编辑主任也不学无术，曾经把一篇国际新闻中的“麦加朝圣”改为“参加朝圣”，成为笑谈。领导人自己出了错，不作自我批评，却要下边的工作人员检讨。仲文他们对这种作派十分恼火，简直不能容忍。他尖刻地说：报社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舐”，只重用会吹会拍的所谓“风·马·牛”干部。

四川人的生活里少不了茶馆，亲朋好友聚会在茶馆，有纷争在茶馆评理排解，无事时清茶一杯在茶馆休闲养神。抗战时期，许多大学内迁到四川，每所大学周围都开了许多茶馆，大学里的教授、学生都接受了四川的这种茶馆文化，养成了坐茶馆的习惯，甚至就在茶馆里上课。茶馆尤其便于大学生们谈天说地，议论风生。这种习惯一直带到解放后。茶馆就成了游仲文他们议论报社里的这些事情以至发泄不满的地方。他们没有意识到，老解放区来的同志很看不惯这种生活方式，何况议论领导的是非。

1951年三反运动后期，着重反对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仲文他们就毫无顾虑地把平常憋在肚子里的意见都提了出来。话也许说得尖锐甚至尖刻一些，他没有感到这是什么严重的事情。他在中国学生导报社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有意见就提，话常常说得很直率；大家为了工作中的不同意见甚至争得面红耳赤，问题一解决，谁也不介意，还是好朋友。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年，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他觉得，现在解放了，而且是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对工作、对领导有意见自然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有想到，党的机关报的这位领导人却拒绝接受善意批评，依然故我，独断专行，压制民主，生活特殊。第二年，就根据小报告，抓住游仲文他们经常在茶馆议论领导这样的“小辫子”，召开编辑部全体大会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宣布他们几个人是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他们不服气，继续对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斗争。1952年学习党的四中全会文件的时候，在市委直属机关党委的干预下，鼓励报社同志揭发这位总编辑的严重官僚主义行为，他才被迫做了一次刮皮潦草的检讨。

不久，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开始，许多私人来往信件被作为“反革命”的罪证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毛泽东还加上许多尖锐的批语。其中被点名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冀汭、绿原、李正廉都曾是复旦大学学生，游仲文和冀汭、李正廉都是中国学生导报社成员，在校时一起参加民主运动和进步社团活动，关系比较密切。于是，重庆日报社领导人就宣布对游仲文进行审查，要他交代清楚和胡风集团的关系。游仲文坦然对之。他想：我历史清白，组织上要查就查，查清楚也就没事了。实际上却并不这样简单。很快，他就被隔离，失去自由。他的家和办公室都被搜查，他的信件、日记、笔记、书籍都被搜了去。那位总编辑

在大会上对他肆意侮辱、谩骂，说他和他的那些同学是“一伙污七八糟的坏人”，“行尸走肉”；说外面盛传重庆日报社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他们这些坏人散布的。查来查去，查不出来他和冀沄、李正廉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就另找借口，把他和杨本泉等的“资产阶级小集团”升级为“反党小集团”。按照这位总编辑的逻辑，说总编辑领导报纸无能就是污蔑党不能办报，批评领导人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必有集团，背后必有“政治背景”。连平时和他们几个人接触较多的一些同志也受到追查。

游仲文他们对副总编辑贾唯英印象比较好，平时对她有些好评。贾唯英是抗日战争初期的地下党员，曾是成都青年爱国民主运动中的核心成员。在重庆日报社的领导成员中，她作风比较民主，对报纸的沉闷的内容和刻板的形式也有意见。那位总编辑对此大为恼火，公然宣称：游仲文“反党小集团”吹捧贾唯英，是抬一部分打一部分、分裂领导、分裂党的行为。还污蔑贾唯英，说她给了小集团什么好处。逼得贾唯英不得不公开表态，说明她和游仲文等在日常工作之外毫无不正常的关系，更说不上给了他们什么“好处”。

游仲文总也不能忘怀一件小事：他被隔离之后很久没有回家，有一天在报社院子里碰到刚刚几岁的小女儿。孩子很多天没有见到爸爸，高兴地喊着爸爸跑过来伸出小手要他抱。失去自由的他只能痛苦地对孩子说了一声“爸爸还有事情”，掉头走去，心底暗暗地流泪。几十年过去了，提起这件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仍然十分沉痛，低声说：“人性、人情、人格都遭到践踏，都不要了。”

总编辑被调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副总编辑贾唯英接手领导肃反运动。这对长期在民主运动中经受陶冶的贾唯英来说，真是一个大难题。几位编辑、记者对总编辑有意见，话说得尖锐点，不大好听，这能说是反党吗？几个老同学、老同事一块儿议论了领导，至多也只能说是有点“自由主义”，何况他们在下面的议论在会上也都公开提出来了，并不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怎能给人扣上“反革命小集团”的帽子呢？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重复总编辑定下的调子，她又会背上怎样的罪名呢？她已经无法挽回局面了。直到运动后期，编委会才降低了调子，定性为“思想落后的小集团性质活动”。而他们的“错误”，头一条不过是准备写信给《人民日报》控告总编辑的官僚主义作风。

1957 年落进了陷阱

对于“落后小集团”这个结论，游仲文他们自然还是难以接受。他们几个人仍然经常坐茶馆，议论对他们至关重要的未了事宜。

游仲文等多次向编委会提出澄清“小集团”一案的要求，问题却拖而未决，

“小集团”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们,使他们的精神受到压抑。这次打击对他们的心灵造成很深的创伤。人事档案袋子里装上这样一个“落后小集团”的结论,而且是“肃反”的结论,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们希望编委会给他们卸下这个包袱,编委会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却一直没有下文。在编辑部里,“小集团”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想不通,为什么批评了领导人,发几句牢骚,就招致这样严重的后果。有些人认为,这不过是总编辑利用肃反运动打击报复批评他的人们,即使没有肃反运动,他也必然要寻找其他机会整这些人的。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号召整风,全国各地上上下下大鸣大放,掀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热潮。5月18日,重庆日报编委会由一个成员出面,匆匆忙忙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宣布为游仲文等人的“小集团”一案平反,并向他们道歉。但是,并没有在原来肃反时候批斗他们的大范围内澄清问题,而且没有退还查抄他们的信件、日记、笔记、书籍。他们觉得报社领导人并不是诚意地解决问题,只是在新形势下为了摆脱被动而作的一种表态。

5月19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文学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座谈会,在会上,杨本泉提出,一个城市可以多办几家报纸。曹岳霖则向市委建议办一张晚报。他们认为,重庆日报社人员过多,人浮于事,互相掣肘,抵消力量,不利于提高新闻工作的时效。完全可以分出一部分人来,另办一个晚报,多登一些适应市民生活需要的新闻,多办几个副刊,肯定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这是游仲文他们几个人多次议论的话题。这期间,他们听说成都要办一个《戏曲报》,重庆要恢复《观众报》,广州也有人提议办晚报,广州市委已经同意,正在筹备。特别是从北京传来消息,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有条件的城市可以办知识分子的报纸,像《文汇报》那样。在这样的气氛下,在重庆办晚报的建议一提出来,立刻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游仲文当时兼职《文汇报》驻重庆特约记者,立即向上海《文汇报》发了消息。贾唯英对他们说,你们提议办晚报,我同意。市委书记任白戈也主张重庆多办几家报纸。原先在《大公报》、《新民晚报》等报纸工作多年,解放后已经分配到其他岗位上工作的一些老报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兴奋不已,说要办晚报他们愿意参加,有的表示可以当记者,有的表示可以编副刊……

6月10日,重庆日报编委会决定在编辑部内部办一份《鸣放报》。在编辑部的座谈会上,大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五位编辑,游仲文、杨本泉都当选了,游仲文得票最多。

同志们的信托,使游仲文忘掉了由于对领导人提意见而被当作反党小集团批斗的沉痛教训。他相信共产党是真诚地要整风,要群众帮助除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三害”。在《鸣放报》第一期上,他以《大家的园地,大家来耕耘》为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发刊词:“当《鸣放报》第一期送到同志们手上的

时候,我们向同志们说:这是你自己的报纸,是我们大家的报纸。顾名思义,这张报纸是鸣放的园地,是发表多种意见的讲坛,欢迎大家来大鸣大放。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意见,是无须顾虑、百无禁忌的。来来来,我们大家来动脑筋,使力气,流汗珠。我们要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三大害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我们要把改进报纸的蓝图一张一张陈列出来。我们来共同办好这张报纸,党会告诉我们:你们是风伯雨师,你们吹洒的和风细雨帮助了党。”

他们几个人被诬指为“小集团”的问题,在大鸣大放中被重新提起。他们把憋在心里很久的话都倾吐出来。他们指出,整“小集团”,实际是报社原领导人对敢于批评他的人施行打击报复,对同志肆意侮辱、谩骂,搜查、隔离,是践踏人权,严重违反宪法,后果十分严重。“小集团”以外的人也就此事提出了批评。一位同志说:肃反的时候宣布的所谓“反革命小集团”,骇人听闻,以后报社人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再也不敢对领导人提什么意见,老虎屁股硬是摸不得,对于明知不对的事情,不说为佳。报社里的民主空气更加稀薄了。有人批评报社原领导人私心太重,水平不高,又要追求个人威信,只能压制别人,滥施淫威,到头来自损尊严,威信扫地。

办报思想上的不同意见,游仲文直率地提了出来。他强调报纸应当更多地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不要把党报办成官报,办成官僚主义的传声筒(后来批斗他的时候,这句话被歪曲为“党报是官僚主义的传声筒”)。他还说,报社在学习苏联办报经验中有教条主义倾向。

有人向他们建议,赶快给市委提出一个具体的可行的计划。曹岳霖就兴致勃勃地和游仲文、杨本泉一起,向熟悉晚报出版发行的朋友了解情况,研究方案,从报纸的名字,版面的安排,所需人员和经费,以至请求任命一位党员做总编辑,约请哪些作家为副刊写连载小说,等等,都考虑得相当周到。他们真的以为,用不了很久,办一张为市民百姓所喜爱的晚报的梦想就能够成真了。

不料,反右派斗争突然降临。他们向市委提出的办晚报的建议,被说成是“为了夺取党的新闻阵地,紧密勾结、联络报社内外人员,日夜策划,积极筹办资产阶级右派的同人报。”经过大会小会多次批判斗争,他们在被迫检讨中不得不承认,“晚报与同人报名称虽然不同,实质上都是削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企图与党报分庭抗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只是用晚报的名称来掩盖其实质而已。”

游仲文对《重庆日报》的意见,也被作为资产阶级右派新闻观点,进行重点批判。领导上还发动编辑部的同志们揭发他们的右派言论。你一言我一语,把他们平日闲谈中的片言只语凑集起来,任意剪接,无限上纲,罗织成为“系统的资产阶级办报理论”,诸如鼓吹报人办报、继承资产阶级办报传统,企图以资产阶